

试论两周时期吴文化的西渐及其影响

熊贤品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两周时期的吴文化在西渐过程中, 与楚及江淮等区域文化发生了融合, 促进了早期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关键词: 两周时期, 吴文化, 西渐

中图分类号: K2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931(2014)02-0009-03

Discussion on the Westward Expansion of Wu Culture and the Impact During Zhou Dynasty

XIONG Xian-pin

(History Depart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westward expansion of Wu Culture during Zhou Dynasty.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ancient culture of Wu, Chu and Jianghuai region began to merge, and promoted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arly na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Zhou Dynasty, Wu Culture, the westward expansion

先秦时期,我国地域及民族文化在发展中已开始相与融合。“吴文化”是当时重要的区域文化之一,其在发展尤其是西渐过程中亦与其他区域文化发生碰撞和融合。因此,探讨“吴文化”的西渐及其与相关地域文化的关系,对于认识先秦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吴文化”的前身是“湖熟文化”。江淮地区商周古文化与宁镇地区“湖熟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如江西万年县肖家山M3出土的带把鼎和带把钵等器具,亦常见于“湖熟文化”中,表明作为吴越文化前身的“湖熟文化”在商代晚期或西周初期就已对江西古文化发生影响。^[1]安徽枞阳、小北墩遗址中有与“湖熟文化”相类的几何形印文陶、仿铜花纹陶钵、带把盆以及大墩遗址的算珠形纺轮等,反映出其与“湖熟文化”的密切关系。^[2]蒋赞初先生曾指出“湖熟文化”的西限可到达安徽境内的长江下游两岸地区,从秦淮河流域的句容浮山梁园、溧水乌山、柘塘,江宁陶吴镇和东善镇等遗址来看,

表明在“湖熟文化”晚期,秦淮河流域及宁镇地区一带与西周文化关系密切,成为西周封国领地,在长江下游两岸丘陵地区,秦汉以前的古代文化可能属于同一系统。^{[3][1]}这些研究表明,作为“吴文化”前身的“湖熟文化”对今天的安徽、江西等地有一定的影响。

“吴文化”发源于宁镇地区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同,且皖南地区也被认为是“吴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关于“太伯奔吴”所在地虽尚有争论,不过学者多认为西周时期吴国的政治中心在丹徒一带,而西周时期江苏境内的“吴文化”遗存主要也在宁镇地区的镇江、南京等地。镇江丹徒至大港沿江一带是吴国早期的核心地区,这里发现有大量墓葬及铜器群,如丹徒四脚墩墓、丹徒石家墩墓、丹徒大港母子墩、磨盘墩、北山顶西周至春秋铜器群、镇江丹阳河山遗址、镇江断山墩遗址等。此外还发现有一些较大的古城,如丹阳葛城为西周吴国城址遗址,年代为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末期,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延续使用时间最长、保存状况较为完好的吴国城址。此

收稿日期: 2013-11-22

作者简介: 熊贤品(1986—),男,湖北鄂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史。

外在其附近还有珥陵古城,亦为吴国古城。

本地区的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一时期吴文化的西渐之况。如位于高淳固城镇北的固城遗址,该遗址有内外两重城垣,其中外城东西长100米,南北长800米,建造年代为西周时期,为其时吴国的重要军事阵地。此外,在高淳还发现西周时期具有吴地风格的兵器;扬州仪征破山口发现的西周晚期铜器,其风格也与吴国青铜器很相近。这些都表明,此时期的长江以北地区也受到了吴文化的影响。^[4]

安徽境内也发现了与吴文化相关的一些遗存,较为突出的是冶炼遗址,如铜陵市朱村乡新民村木鱼山矿冶遗址,年代约为商末周初;位于皖南的牯牛山城是一座西周时期的古城址,在安徽省南陵县石铺乡西进村境内,城址呈长方形,外围有水道环绕,这可能与当时吴先民开采皖南地区的矿产有关;安徽省南陵县江木冲矿冶遗址,年代为西周晚期。另外还有刘家井、西边冲等矿冶遗址,以及长江北岸的枞阳发现的西周采矿遗址等,这些都是与吴文化具有密切关系的冶炼遗址。

安徽境内发现的一些器物也体现了与吴文化的联系。皖南地区东部的宁国官山遗址,年代为西周中期偏晚至西周晚期,其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有些器物如带把手鬲、鼎等,与江苏宁镇地区发现的西周时期的同类器物接近。这反映出官山遗存与江苏宁镇地区文化是相联系的。^[5]在青铜器方面,从淮河流域发现的西周时期的铜器来看,其属于周式铜器,而江淮南部文化更多的是受到吴文化的影响,^[6]安徽繁昌发现的汤家山青铜器群,其年代为西周中期至西周晚期,其中的龙纽圈足盖盃与宁镇地区发现的烟墩山、破山口等鼎形盃具有相同的文化因素,表明了两地之间的文化联系。^[7]

不过,西周及其以前的江淮古文化受到吴文化的影响是比较小的,直到春秋时期江淮古文化尚保留较多的自身特征,到战国时期才完成了与楚、吴越等文化的融合。

西周时期,江西地区主要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太伯奔吴”之“吴”,实为江西的吴城,不过从考古发现来看,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但是,吴文化对于其时的江西地区确实有所影响,比如乾隆年间江西临江府出土了具有吴越风格的青铜钟,赣鄱地区出土的一些陶器,其扉枝、角状把、龛齿纹等与吴地陶器的器形、风格类似。这些都表明,西周至东周前期,“湖熟文化—吴越文化”对

江西古文化的影响。^{[3][11]}

二

春秋时期,吴文化中心已逐渐转移到太湖流域,理由是:在江苏宁镇地区发现有大量东周时期的吴文化墓葬遗存,如南京锁金村遗址,六合程桥墓地,丹徒大笆斗墩墓,丹阳大夫墩墓,丹徒南岗山春秋前期墓,溧水柘塘蔡家山春秋晚期土墩墓,溧水凤凰井春秋中期土墩墓,宜兴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黄梅山、南山、四墩山遗址,宜兴西渚吾桥村春秋晚期古河道及独木舟遗址等。此外,还发现一些具有吴文化特征的重要城址,如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湖塘镇的淹城,此为“三城三河”形制,年代属于春秋晚期,这是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吴国古城址,可能是吴国的军事城堡;位于江苏省无锡市与常州市武进交界处的阖闾城,年代为春秋晚期,并一直沿用到战国时期;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湖塘镇的留城,年代约为春秋晚期,其附近还有胥城,也都为吴国城址。

在宁镇地区还发现一些吴国的青铜器,如六合、盱眙、高淳、武进等都出土有吴国风格的铜器及兵器。安徽地区也有一些东周时期的吴文化遗存,如铜陵县新桥乡凤凰村万迎山矿冶遗址等。另外这一地区还发现一些与吴文化相关的墓地,如繁昌县汤家山墓、屯溪地区墓地、南陵土墩墓、郎溪土墩墓等,其中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郎溪土墩墓,表现出明显的吴文化特色。^[8]

江西地区也发现了东周时期的吴文化遗存,如上饶马鞍山土墩墓,其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初年,属于吴越文化之列,^[9]樟树观上乡曹溪则发现有春秋晚期的吴国贵族墓。此外,玉山土墩墓、清江观上战国早期墓葬、九江石钟山商末至西周遗址等都具有吴文化的因素。而赣西北的九江神墩周代遗址,则包含了吴、楚等文化因素。东周时期这一地区的玉器文化也受到吴文化的影响,如江西靖安县李洲坳春秋晚期群棺墓葬中所发现的玉器,就包含有吴文化的因素,其中的玉觿与寿县蔡侯墓中所发现的同类器物以及苏州真山吴国墓葬中所发现的玉觿风格特点相同,显然是受到了吴文化的影响。^[10]

吴文化的西渐改变了江西地区古文化的面貌,所以彭适凡认为,从文化面貌的特征来看,西周时期这一地区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多,而到春秋时期则发生了改变:“从一些古文化遗存和出土的青铜器来看,鄱阳湖—赣江流域的古文化面貌,似又有着新的变化趋势……中原文化对这一地区的直

接作用开始减弱了。相反的，地处东面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却给了这一地区的强烈影响，另一方面，地处西方的荆楚开始崛起，也给了这一地区以重大影响，大体鄱阳湖—赣江以东地区受吴、越文化的影响较大，以西地区则更多地受到楚文化的影响。^[11]这一观点是可信的。

三

自春秋时期开始，随着楚国势力的日益强大，楚文化开始向东扩张，吴文化的西渐也相应有了变化。大约在春秋中期，楚国的势力范围已达今天的赣西北地区，并且到公元前504年之前，这里一直都属于楚国，而此时的吴国势力范围则未达到鄱阳湖以西地区。直到公元前504年，吴王“伐楚取番”之后，赣西北一些地方才为吴国所占领。^[12]约春秋中期，即楚庄王时代，楚国的疆域扩大到今天的江淮地区。其后，吴楚两国进入拉锯战时期，因而此时楚文化对江淮地区的影响较为微弱。不过，从春秋中晚期开始，楚文化对皖西诸方国的影响已大大超过吴越文化，并与中原文化相抗衡。^[13]到春秋末期，吴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又有所恢复，比如寿县蔡昭侯墓出土的文物中，其吴文化的影响非常明显，但此后这一进程因吴国灭亡而终止。

吴文化的西渐，包含有经济与政治等因素，其中前期以经济因素为主，而后期则以政治因素为主。皖南地区是中国三大青铜产地之一，这一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是吴国及吴文化西渐的重要原因。而春秋时期晋、吴联合抗楚格局的形成，则是吴文化西渐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因。自公元前598年的“邲之战”中晋败于楚后，晋国的霸权被削弱，其后晋国采取“联吴制楚”的策略，即扶持吴国以挟制楚国。到春秋中后期，楚国改北上扩张政策为东进，使江淮地区成为吴楚征战的重要战场，东周时期吴楚间规模较大的战争即有20余次。这就是江淮地区发现这一时期吴文化遗存较多的重要原因。

吴文化的西渐有着积极的影响，首先是促进了人才的流动。申公巫臣由晋入吴，伍子胥由楚入吴，一批优秀人才来到吴国，吴国在军事方面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了此时期吴国的强大情况：“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14]此外，为了军事需要，一批吴国士人也开始在列国间奔走，从而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此同时，吴国先进的兵器技术也得到了传播，如吴国的剑、矛等制造技术便被其他国家所吸收，楚国即运用向吴越学来的先

进工艺技术铸造了大量优质的青铜剑，因此楚式剑形制与吴越式剑较为相近。所以有学者指出：“春秋末，越灭吴。战国中，楚灭越。从此吴越的铸剑绝技为楚人所用，楚国的青铜剑就甲于天下了。”^[15]

吴文化的西渐也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融合，在此过程中，吴文化在某些方面也表现出了从“中原化”到“楚化”的过程。如江宁陶吴镇及南京浦口长山子出土的春秋前期的青铜器，类型与中原地区相似；六合程桥出土的春秋晚期的青铜器则与楚、蔡等青铜器在艺术类型上相近。^[16]同时，楚文化也吸收了吴文化的一些因素，如楚地的铜器对吴越铜器刻纹法的吸收，这已在长沙楚墓中出土的针刻纹漆奁上得到了证明，表明了楚人对于这种形式的接受与喜欢。

综上所述，两周时期吴文化的西渐，不仅改变了所及地区的文化面貌，也使其自身的文化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并使先秦时期的吴、楚及江淮地区的古文化发生融合，从而促进了多样而统一的文化的形成，促进了早期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 刘诗中，许智范. 东周时期江西地区吴文化初探[J]. 南方文物, 1982(2): 27-33.
- [2] 杨立新，高一龙. 安徽枞阳、庐江古遗址调查[J]. 江汉考古, 1987(4): 7-11.
- [3] 蒋赞初. 长江中下游历史考古论文集[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 [4] 张敏. 破山口青铜器三题[J]. 东南文化, 2002(6): 46-53.
- [5]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安徽宁国市官山西周遗址的发掘[J]. 考古, 2000(11): 14-23.
- [6] 宫希成. 安徽淮河流域西周时期文化试析[J]. 东南文化, 1999(5): 38-44.
- [7] 张爱冰，陆勤毅. 繁昌汤家山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J]. 文物, 2010(12): 52-60.
- [8] 宋永祥. 郎溪土墩墓初探[M]//文物研究: 第2辑. 合肥: 黄山书社, 1986: 48.
- [9] 李家和，卢国复，杨巨源. 上饶县马鞍山西周墓[J]. 东南文化, 1989(4): 38-45.
- [10] 蔡青，朱勤文. 江西及其邻省东周玉器的工艺和文化对比[J]. 宝石和宝石学杂志, 2011, 13(1): 52-56.
- [11] 彭适凡. 赣鄱阳地区西周时期古文化的探讨[J]. 南方文物, 1987(2): 92-99.
- [12] 彭适凡. “吴头楚尾”辨析——江西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归属问题的探讨[J]. 南方文物, 1987(1): 26-32.
- [13] 方林. 从考古发现看皖西楚文化的发展历程[M]//文物研究: 第11辑. 合肥: 黄山书社, 1998: 272.
- [14]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1729.
- [15] 张正明. 楚文化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148.
- [16] 李学勤. 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的发展[J]. 文物, 1980(8): 35-40.

(责任编辑：毕士奎)